

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测度问题

蒋南平 郑万军

摘要：本文在改进 A-F 多维贫困指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返贫识别及测算方法。采用这些方法，本文使用 2010~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进行了测度，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返贫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发生贫困的重要原因；第二，新一代农民工返贫指数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差距在缩小；第三，健康、融入城市等维度对新老农民工多维返贫的贡献不同。

关键词：农民工 多维贫困 多维返贫指数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 40 年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之对应的是，在减贫的同时，返贫现象始终与之相伴。脱贫人口的返贫率居高不下，是中国新型贫困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

目前，关于贫困的测度、影响因素以及反贫困对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和成熟，特别是在贫困的界定和测度方面。在贫困的界定上，有单维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研究；在贫困的测量上，有与之对应的各类指数，例如，单维贫困测量有 Sen 贫困指数、FGT 贫困指数和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贫困指数等，多维贫困测量有 Watts 法、A-F 贫困双重识别法、HPI 法和村级多维贫困测度法等。但较为遗憾的是，与贫困相伴的返贫方面的研究文献在国内外均相对较少。已脱贫或原非贫困人员返贫的程度关系到减贫的对策和效果，如何界定和度量返贫也关系到反返贫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因此，如何界定和度量返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贫困研究现状及研究返贫问题的困难

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静态研究出发，主要是研究一个群体在某时间点上发生贫困的状态，但是，这类研究无法揭示贫困的变动情况，例如，下一期的贫困是由上一期的非贫困状态变动而来，还是由原来的贫困状态延续而来，这一点无法得到说明。因此，为了研究个体在多个时间点上的贫困状态，当前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早已转向动态研究：从较长的时间范围考察个体或家庭进入或者退出贫困的运动过程。本文考察的返贫是指个体或家庭由非贫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的运动过程。因此，返贫问题实质上属于动态视角的贫困范畴。目前单纯考察并测度返贫程度的研究文献较少，而在贫

困的动态性中考察返贫和脱贫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将现有的贫困动态性视角的返贫研究文献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研究是在讨论贫困的动态性时，主要应用统计分析和转移矩阵的方法考察各阶层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王朝明、姚毅（2010）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转移矩阵的方法，考察了中国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张志国、聂荣（2014）同样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了在外界正向和负向冲击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农村家庭脱离贫困和进入贫困的概率。这类分析的局限性在于：①从内容上仅仅考虑了收入方面返贫的情况，不能从多维的角度考虑贫困和返贫的状态，通过这种分析人们无法得知健康、生活水平、医疗等多维度的返贫过程，同时，单就收入而论贫困，人们也无法知晓是什么样的个体在收入维度再次进入贫困；②从方法上仅仅分析了个体进入贫困的概率，无法分析返贫个体进入贫困的程度，在考察返贫的深度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类研究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从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角度动态地研究贫困问题。这类研究并没有直接提出返贫的概念，而是将贫困和非贫困状态纳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进行整体性研究，在将消费或者收入进行加总及平滑的基础上，先将贫困分类为慢性贫困、慢性兼暂时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再定量分析各类贫困的程度。Gustafsson and Ding（2009）使用2000~2002年中国22个省份的样本农户数据，按陷入贫困的年限将贫困的状态区分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并分析了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家庭的比例。章元等（2012）提出了一种度量家庭或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总贫困的方法，在将总贫困分解为暂时性贫困成分和慢性贫困成分的基础上度量了中国农村的贫困。

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类研究无法衡量个体贫困程度的局限性，但是，若应用于返贫问题研究，将有一定的不适之处：首先，这种分类方法是将一段时间内的贫困、脱贫及返贫状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贫困、脱贫及返贫状态从整体的视角划分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并没有从返贫的角度研究返贫问题，更没有相应的指数去衡量返贫程度，因此，这种方法对返贫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其次，这种方法所研究的贫困问题与返贫问题并不等同，即所研究的内容和结果不尽相同。假设某一个家庭三年的收入分别为3、2、5，另一个家庭为5、3、2，第三个家庭为2、5、3，贫困线为4。从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视角，这三个家庭的贫困状况相同，都为慢性贫困兼暂时性贫困，按该方法分解得到的慢性和暂时性贫困成分相同。但是，从返贫的视角出发，这三个家庭的贫困状况完全不同。第一个家庭经历了脱贫过程，第二个家庭经历了返贫过程，第三个家庭经历了脱贫后再返贫的过程。从返贫的角度，不仅能够得到个体贫困的结果，更能够精确地把握个体贫困的过程；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度量返贫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对贫困结果的度量。

第三类研究是从预期的贫困脆弱性出发来研究家庭或个体在未来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目前，关于贫困脆弱性的定义有多种，与各定义对应的测度方法亦有多种，但其核心思想是从风险的角度以家庭或个体目前的状态去预测其未来的贫困状态，并且预测的精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方法并不是度量返贫的实际状态，研究范畴有一定的超前性。

以上三种类型研究不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与返贫的度量有较好的契合性，这

给中国农民工返贫问题研究造成很大困难。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方法都没有衡量贫困的多维性，没有从多维的角度去考察多维贫困及贫困的变动，因此，构建多维返贫指数以衡量返贫状况非常必要。

三、多维视角下中国农民工返贫指数的构建

要度量返贫，首先需要理解贫困，因为返贫的本质是重新贫困。而构建多维视角下的返贫指数，首先需要定义多维贫困和多维返贫。阿玛蒂亚·森将可行能力的理念引入贫困分析，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催生出多维贫困理念，从而以多维的角度去衡量贫困。返贫从定义上看，分为广义的返贫和狭义的返贫。狭义的返贫是指从贫困到脱贫的人口再次返回贫困的过程，广义的返贫是指凡是从非贫困状态转移到贫困状态的过程都为返贫。由于贫困有一定的粘性，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广义上的多维返贫，即个体由多维非贫困状态转移到多维贫困状态的过程。多维贫困的识别一般借助于 Alkire and Foster (2011) 提出的双界线方法（以下简称“A-F方法”）。这里的多维返贫识别以多维返贫定义为基础，借鉴 A-F 方法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后再进行多维返贫识别。其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确定样本观测矩阵。设 $M_{n \times d}^t$ 代表 t 期 $n \times d$ 维矩阵，矩阵 M 中的元素设为 X ，代表每个个体在 d 维度上的取值。 X 中任意元素记为 X_{ij}^t ，代表 t 期个体 i 在维度 j 上的取值，其中， $i=1, 2, \dots, n$ ， $j=1, 2, \dots, d$ 。

第二，各维度贫困识别。设定多维贫困中 j 维度的贫困线分别为 Z_j ，由于返贫问题研究的是贫困变化的过程，本文假设研究的为第 t 年和第 $t+1$ 年的情况，将第 t 年和第 $t+1$ 年个体 i 在维度 j 上的值 X_{ij}^t 与 j 维度的贫困线 Z_j 比较。若 $X_{ij}^t \geq Z_j$ ，则记为 $g_{ij}^t=0$ ；若 $X_{ij}^t < Z_j$ ，则记为 $g_{ij}^t=1$ 。将多维的剥夺数进行加总，得到个体 i 在 t 年被剥夺的维度个数：

$$C_i^t = \sum_{j=1}^d g_{ij}^t \quad (1)$$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个体 i 在 $t+1$ 年被剥夺的维度个数。

第三，多维贫困识别。将个体的多维贫困记为 P ，个体 i 在 t 年多维贫困定义为：

$$P_i^t = \begin{cases} 1, & \text{当 } \sum_{j=1}^d g_{ij}^t \geq 2 \text{ 时}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quad (2)$$

(2) 式为现有文献多采用的关于多维贫困的定义。当个体 i 贫困总维度数大于等于 2 时，定义个体 i 在 t 年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同理可以得到个体 i 在 $t+1$ 年的多维贫困状态。

第四，多维返贫识别。首先，定义基于多维贫困的返贫：

$$q_i^{t/t+1} = \begin{cases} 1, & \text{当 } P_{ij}^t = 0 \text{ 且 } P_{ij}^{t+1} = 1 \text{ 时}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quad (3)$$

即个体 i 在 t 年为非贫困状态, 在 $t+1$ 年为贫困状态时, 记为从 t 年到 $t+1$ 年个体 i 多维返贫。其次, 各个维度的返贫以个体的多维返贫为前提, 根据识别出的返贫状态定义出各维度的返贫:

$$g_{ij}^{t/t+1} = \begin{cases} 1, & \text{当 } g_{ij}^t = 0, g_{ij}^{t+1} = 1 \text{ 且 } q_i^{t/t+1} = 1 \text{ 时}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quad (4)$$

在识别了每个个体的多维返贫后, 需要对返贫的个体进行加总, 以对各维度的返贫状况进行度量 and 分解。构造的具体指数及过程如下:

第一, 计算返贫率。返贫率和贫困率的计算方法一样, 加总出返贫总人数即可, 计算公式如下:

$$H = \sum_{i=1}^n q_i^{t/t+1} / \sum_{i=1}^n (1 - P_i^t) \quad (5)$$

(5) 式中, n 为样本中的总人数, $\sum_{i=1}^n q_i^{t/t+1}$ 为返贫人数, $\sum_{i=1}^n (1 - P_i^t)$ 为 t 期非贫困人数。为了方便, 本文将返贫人口总数记为 $q = \sum_{i=1}^n q_i^{t/t+1}$, t 期非贫困人数记为 $n_1 = \sum_{i=1}^n (1 - P_i^t)$, 则返贫率简化为:

$$H = q / n_1 \quad (6)$$

第二, 定义多维平均返贫份额。返贫率只能用来衡量返贫的广度, 并不能反映返贫的深度, 因此, 需要能够反映返贫深度的指标。定义多维平均返贫份额如下:

$$A = \frac{\sum_{i=1}^n q_i^{t/t+1} (C_i^{t+1} - C_i^t)}{qd} \quad (7)$$

(7) 式中, q 为上文中的返贫人数, d 为总维度数。用 C_i^{t+1} 减去 C_i^t 得到返贫的维度个数。

第三, 计算多维返贫指数。结合度量返贫广度的返贫率与度量返贫深度的多维平均返贫份额, 可以得到多维返贫指数:

$$M_0 = \frac{\sum_{i=1}^n q_i^{t/t+1} (C_i^{t+1} - C_i^t)}{n_1 d} \quad (8)$$

不难发现, $M_0 = HA$ 。

第四, 计算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额与贡献率。第 j 维度的贡献额为:

$$M_{0j} = \frac{\sum_{i=1}^n q_i^{t/t+1} (g_{ij}^{t+1} - g_{ij}^t)}{n_j d} \quad (9)$$

第 j 维度的贡献率为:

$$C_j = M_{0j} / M_0 = \sum_{i=1}^n q_i^{t/t+1} (g_{ij}^{t+1} - g_{ij}^t) / \sum_{i=1}^n q_i^{t/t+1} (C_i^{t+1} - C_i^t) \quad (10)$$

综合以上步骤, 各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的识别与 A-F 法的多维贫困指数相同, 但返贫指数增加了返贫的识别。本文在返贫识别的基础上, 用返贫率度量返贫的广度, 用多维平均返贫份额衡量返贫的深度, 结合返贫的深度和广度设计了多维返贫指数, 对于各个维度的返贫贡献, 可以在多维返贫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各维度的贡献额和贡献率。下文将针对多维返贫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比较, 就返贫指数的属性进行分析。

四、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指数的属性

多维返贫指数是在多维贫困识别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该指数看似与 A-F 多维贫困指数区别不大, 但存在实质上的差别。

首先, 在识别方面, 多维贫困指数采用双界法进行了两次识别——各维度的贫困识别和总体多维度的识别; 多维返贫指数借用了双界法的思想, 在多维贫困识别之后, 根据贫困的动态性, 比较两期多维贫困的状态后进行了返贫识别, 即多维返贫指数构建之前对返贫进行了多维的三次识别。

其次, 由于贫困和返贫的内涵不同, 多维贫困和多维返贫的识别过程不同, 指数的构建过程和贫困指数中加总的对象也不同。返贫指数中加总的对象不仅是贫困, 还需要满足贫困状态变动的条件, 即由非贫困转移到贫困。假如某个体已被识别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 在某个维度上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在计算多维贫困指数时, 该个体进入加总计算。但是, 在计算返贫指数时, 如果不满足返贫识别, 该个体各维度不进入加总, 返贫份额和返贫指数为零。另外, 返贫指数和贫困指数的基数不相同, 贫困的基数是所有样本, 而返贫的基数是所有样本中基期非贫困人员。

最后, 多维贫困指数本质上所度量的还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虽然它可以进行各期之间的纵向比较, 但这种纵向比较是把各期的贫困状态度量之后的比较, 其实质是一种静态之间的比较。多维返贫指数在多维返贫识别时就进行了各期之间纵向比较, 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度量了各期之间贫困的变化过程。

贫困指数应与一系列伦理上的准则相一致, 要使得贫困指数具有良好的性质, 需要满足一系列公理性条件。多维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较单维贫困指数更为苛刻。Satya and Amita (2005) 在单维贫困测度公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多维贫困测度的 12 条公理: 聚焦性公理、标准化公理、单调性公理、复制不变性公理、对称性定理、连续性公理、子群可分性公理、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非贫困增长性公理、转移性公理、规模不变性公理、贫困维度间关联增强性转换非下降公理。其中较为重要或较难满足的公理为聚焦性公理、单调性公理、子群可分性公理。下面将讨论本文提出的返贫指数

是否满足公理化条件。

第一，与所有贫困率（单维和多维的）一样，返贫率满足除单调性公理以外的其它公理。单调性公理要求当其它人员的所有维度的状态不变时，如果某个返贫人员的状况变得更差，贫困指数应该相应增加。显然，返贫率的计算是以返贫人口数为依托的，它并不计算返贫的深度。不论某个返贫人员的贫困状态是好还是差，在识别为返贫后都记为 1，因此，加总后的返贫率不能满足单调性公理。也正因如此，需要以多维平均返贫份额及返贫指数来反映返贫的深度。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的第一条核心公理为聚焦性公理，它要求某一维度上贫困状况的改善并不影响另一维度上的剥夺，即要求某一贫困主体的不同贫困维度不可相互替代。将其推广到多维返贫测度，应该是某一维度上的脱贫或返贫并不影响另一个维度上的返贫或脱贫。能够综合度量返贫深度和返贫广度的多维返贫指数 M_0 在贫困识别时，各维度的贫困识别相互独立，能够满足这一公理。

第三，上述第一条已经叙述了多维贫困指数单调性公理的要求，以此类推，多维返贫指数应该在保持其它因素不变时，处于返贫状态的主体的返贫维度变多时，所度量出的返贫水平上升。上文构造出的多维返贫指数 M_0 为 $t+1$ 期贫困维度数减去 t 期贫困维度数的加总，当某主体贫困状态恶化后，该指数上升，满足单调性公理。

第四，多维贫困测度的另一条较为重要的公理为子群可分性公理，它要求如果将总人口按照种族、地理以及其它分类依据划分为几个子类，则总贫困指数可以分解为以人口比重为权重的各子群贫困指数的加权之和。以此类推，多维返贫指数不仅满足子群可分解性公理，还满足各维度的可分解性。下文将利用该方法将农民工分解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分别考察其总体和各个维度上的返贫情况。该指数可分解的性质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把握各子群和各维度的返贫状况，并制定针对性的减贫策略。

五、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度量

上文提出了一个度量和分解多维返贫的方法，下面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来度量和分析中国农民工的多维返贫状况。

（一）数据来源

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 样本覆盖北京、黑龙江等 25 个省（区、市），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三次追踪调查所得的个体，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高体重、个人健康自评、医疗保险、收入等个体信息。本文从 16000 个样本户中筛选出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经过匹配后共筛选出三期都接受过调查的样本农民工 2459 个，并按 1980 年出生为界将样本农民工分为新老两代农民工，其中，老一代农民工 1847 个，新一代农民工 612 个。

（二）数据描述及贫困维度选择

多维贫困的维度与指标选择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衡量尺度，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

被较为广泛采用的维度有收入、健康、教育、医疗、生活质量等。在参考国际通用的多维贫困指数所采用的维度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并结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特点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选取了收入、健康、生活质量、医疗服务、融入城市 5 个维度。收入维度中关于贫困线的选择对于度量贫困水平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经历了由每天 1.25 美元向 1.9 美元的调整。已有研究对贫困线的设置多集中于每天 1.25 美元到 2 美元之间。例如，王朝明、马文武(2014)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时采用了每天 2 美元的标准，王春超、叶琴(2014)在分析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时采用了每天 1.25 美元的标准。另有一部分研究采用了每天 2 美元和 3 美元的标准以进行比较，如夏庆杰、宋丽娜(2007)在研究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动趋势和模式时分别采用了 2 美元和 3 美元标准以进行对比。综合考虑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和贫困线标准的调整，本文采用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并根据相应的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以及各省市的 CPI 对贫困线进行了折算。其它维度中，王春超、叶琴(2014)在研究农民工多维贫困时纳入了医保和健康维度，郭熙保、周强(2016)在研究农民工长期多维贫困时将医疗服务和健康纳入了考察范围。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以及农民工权利受剥夺的深度，本文将健康、医保、生活质量、融入城市生活纳入待考察的维度中。由于中国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后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融入城市，本文采用 CFPS 调查问卷中“您是否因为户籍而受到不公”和“您是否因为贫富差距而受到不公”来衡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具体维度及指标见表 1。

表 1 维度、指标、临界值及权重选取与设定

维度	指标	临界值	权重
收入	人均年纯收入	收入贫困线为 2 美元(2010 年)/人·天，低于收入贫困线为贫困	1/5
健康	身高体重	BMI(身体质量指数)小于 18.5 为贫困	1/10
	自评健康	自评健康状况差为贫困	1/10
医疗服务	及时就医	患病后不能及时获得正规医疗就医为贫困	1/10
	医疗保险	没有任何一种医疗保险为贫困	1/10
生活质量	做饭燃料	常用的做饭燃料为非清洁燃料为贫困	1/20
	卫生设施	厕所类型，不能使用室内冲水、室内马桶判定为贫困	1/20
	住房	住房面积低于 12 平方米为贫困	1/20
	饮用水	室内没有自来水为贫困	1/20
融入城市	融入城市生活程度	因户籍而受到不公待遇为贫困	1/10
		因贫富差距而受到不公待遇为贫困	1/10

本文维度选择与已有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本文未选取教育维度，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返贫与贫困的研究内涵并不相同，甚至区别较大。返贫更为关注的是福利状况向下变动的过程。鉴于此，返贫在维度上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较易变动的维度，比如收入维度，可由贫困向非贫困转换(脱贫)，

也可由非贫困向贫困转换（返贫），但教育经历具有较强的非逆性，可存在于脱贫过程，但并不能存在于从非贫困状态向贫困状态转化，不存在于返贫过程。二是本文的研究群体为农民工，该群体的受教育经历多为高中、职高及以下水平，且其受教育程度多已固定，最为常见的变动也是接受一定的岗位培训，不存在教育的向下变动即返贫问题。因此，本文并未将教育纳入到返贫的研究维度中。

（三）多维返贫结果及分析

1.单维返贫发生率。在上文阐述的方法中，在进行多维返贫测量前，需测量单维贫困并进行贫困识别。为了衡量贫困人口中返贫人口的比例，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返贫人口与贫困人口的比例。

表2所报告的贫困和返贫的发生率由于维度的不同，它们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也不尽相同。在贫困率方面，收入、医疗、生活质量三个维度的贫困率虽偶有波动，但总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健康维度的贫困率持续上升；融入城市维度的贫困率先下降后又急剧上升。返贫率与贫困率随时间变化的特点不同：收入和融入城市维度的返贫率处于上升的趋势，健康、医疗、生活质量维度的返贫率随时间推移而持续下降。

表2 单维贫困和返贫发生率

维度	年份	贫困率 (%)	返贫率 (%)	返贫人口与贫困人口比例 (%)	新一代农民工返贫率 (%)	老一代农民工返贫率 (%)
收入	2010	13.7	—	—	—	—
	2012	7.1	6.12	71.59	5.13	6.22
	2014	8.1	8.22	83.67	8.29	7.31
健康	2010	4.9	—	—	—	—
	2012	12.2	11.73	95.65	3.75	14.41
	2014	12.6	7.78	54.02	2.54	9.73
医疗服务	2010	13.6	—	—	—	—
	2012	8.2	5.79	60.89	5.81	5.78
	2014	4.9	3.36	63.33	3.45	3.33
生活质量	2010	15.3	—	—	—	—
	2012	14.7	11.50	61.22	11.79	11.42
	2014	8.2	7.50	49.23	7.90	7.20
融入城市	2010	15.4	—	—	—	—
	2012	13.0	10.16	66.09	9.08	10.54
	2014	20.9	18.21	75.63	21.80	17.06

两者的对比说明，返贫率和贫困率的特点并不一致，贫困率的下降可能伴随着返贫率的上升，贫困率的上升也可能伴随着返贫率的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贫困率的发生主体是全体样本，返贫率的发生主体是非贫困样本，全体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状态和非贫困农民工返回贫困状态的特征

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在健康维度上，贫困发生率处于上升的趋势，但返贫发生率处于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处于非健康状态的农民工数量虽然在上升，但是，这部分非健康状态的农民工的每年增加额有下降的趋势，由健康状态转移到非健康状态的农民工比例在减少，因而返贫率下降。

鉴于此，有必要考察贫困人口中返贫人口的比例，比如 100 个贫困人口中，若有 40 个或 60 个贫困人口是由上一期的非贫困人口转化而来，虽然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都相同，但是，贫困的构成并不相同。表 2 列出了各个维度的贫困人口中返贫人口所占比例，从中可以发现这一比例都在 50% 以上，说明现阶段中国农民工中的贫困人口主要由返贫人口而来，返贫是贫困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收入维度，2012 年和 2014 年，农民工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 71.59% 和 83.67%。这说明，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后收入维度的贫困得到了大大缓解，但是，其收入处于波动状态，在各种风险的冲击下他们很容易再次陷入贫困之中。

表 2 分别考察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各维度的返贫率。可以发现，两代农民工在各维度表现出不完全一致的特征。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在收入维度上，2012 年，新一代农民工的返贫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低；在经历了相同的上升趋势之后，2014 年，新一代农民工的返贫率却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说明，新一代农民工的收入处于更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更易返贫。在健康维度上，老一代农民工的返贫率远远高于新一代农民工；较为巧合的是，2012 年和 2014 年，老一代农民工的返贫率都是新一代农民工的 3.8 倍，即 1 个新一代农民工在健康维度的返贫伴随着大约 4 个老一代农民工返贫。在医疗服务维度上，新老两代农民工的返贫率几乎相同，变化趋势也一致。在生活质量维度上，新老两代农民工的返贫率都有所下降，且下降程度较为接近。在融入城市生活维度上，新老两代农民工的返贫率都随时间变化处于上升的趋势。

综合上述分析，返贫率较于贫困率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各个维度的返贫是农民工最终发生贫困的主要因素和重要原因。另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各维度上返贫的变化趋势和特征不完全一样。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的多维度返贫，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各维度的返贫状况，下文将测算多维返贫率并对多维返贫按维度和子群进行分解。

2. 多维返贫发生率。如上文所述，本文定义发生两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为多维贫困，否则为多维非贫困。当某个体的状态由多维非贫困转移到多维贫困时，该个体发生多维返贫。按照上文阐述的方法，本文计算出了农民工多维返贫指数。由于该指数符合子群可分解性公理，将农民工按出生于 1980 年之前及之后分为新一代和老一代两个子群并分别计算其多维返贫指数。表 3 列出了农民工及其两个子群的多维返贫指数。

分析表 3 可以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整体上较为平稳且略有下降，由 2010 年的 7.6% 下降到了 6.8%，下降幅度并不大。与贫困相伴相随的返贫发生率也有下降的趋势，并且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返贫率与贫困率的差距不是很大，进一步说明多维贫困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多维返贫。本文考察了农民工 5 个维度上的返贫状况，多维平均返贫份额几乎不变，返贫个体的平均返贫维度为 0.28 个。结合了多维返贫率和多维平均返贫份额的多维返贫指数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下

降趋势是多维返贫率的下降所导致的。这也说明了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返贫状况得到了好转。

表 3 多维返贫指数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贫困率 (%)	7.6	8.1	6.8
农民工	多维返贫率 (H)	—	6.7	5.4
整体	多维平均返贫份额 (A)	—	0.280	0.292
	多维返贫指数 (M_0)	—	0.017	0.015
新一代	多维返贫率 (H)	—	0.042	0.046
农民工	多维平均返贫份额 (A)	—	0.221	0.289
	多维返贫指数 (M_0)	—	0.010	0.012
老一代	多维返贫率 (H)	—	0.079	0.056
农民工	多维平均返贫份额 (A)	—	0.312	0.292
	多维返贫指数 (M_0)	—	0.023	0.016

为了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状况，表 3 分别列出了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指数。不难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特点各有不同：新一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率和多维平均返贫份额有上升的趋势，因而多维返贫指数上升；老一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率和多维平均返贫份额有下降的趋势，因而多维返贫指数下降。虽然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指数一升一降，但老一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指数在 2014 年依然高于新一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福利和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是农民工迁移至城市的拉力所在，新老两代农民工返贫状况的不同可能是农民工回流至农村的原因之一：老一代农民工较大的返贫可能性导致其回流至农村的可能性增大，新一代农民工较小的返贫可能性导致其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可能性增大。在这种新老两代农民工迁移和回流的并行状态中，农民工整体上时而表现为迁移，时而表现为回流，但由于整体贫困率和多维返贫指数的改善，农民工在总体数量上表现为迁移至城市。

多维返贫指数能够反映出农民工多个维度返贫的整体变化。为进一步分析是哪些维度造成了农民工的多维返贫以及各维度作用的大小，本文对多维返贫进行了分解（见表 4）。

表 4 各维度对多维返贫指数的贡献率 (%)

维度	年份	收入	健康	医疗服务	生活质量	融入城市
农民工	2010~2012	-2.62	40.83	14.53	32.51	14.75
整体	2012~2014	7.62	27.23	10.02	23.65	31.48
新生代	2010~2012	-8.76	18.87	8.10	55.56	26.23
农民工	2012~2014	10.18	19.53	12.10	16.58	41.61
老一代	2010~2012	-0.66	42.41	16.28	29.88	12.09

农民工	2012~2014	5.73	29.83	9.21	28.12	27.11
-----	-----------	------	-------	------	-------	-------

从表 4 可以发现, 各维度对农民工返贫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 健康、生活质量和融入城市维度是农民工多维返贫的重要原因, 收入和医疗维度对返贫的影响较小。这也更进一步表明了农民工迁移至城市务工的原因: 在改善收入维度状况的前提下, 他们能够忍受其它维度福利状况的恶化。通过纵向比较, 还能发现各维度的变动情况。健康、生活质量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虽然较高, 但是, 其贡献程度处于下降的趋势, 融入城市维度则处于上升的趋势。随着农民工迁移至城市和相关政策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动, 相关政策应该更加注重城市对农民工的包容和接纳。

从农民工内部看, 各维度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返贫指数的贡献不同。以 2012 至 2014 年为例, 对于新一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维度的贡献率较大, 收入维度的贡献率较小; 但是,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 健康维度的贡献率较大, 收入维度的贡献率较小。这表明, 对于不同的农民工群体, 在制定相关的防止返贫的政策时, 着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新一代农民工, 更应注重生活质量和融入城市生活程度方面的改善,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适应城市;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 更应该注重健康、医疗服务方面的支持, 防止他们因病返贫。

六、结论

本文总结了现有的研究贫困的动态性中所涉及的返贫问题, 在多维贫困识别双界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多维返贫的方法, 并提出了测算多维返贫的方法。本文论证了利用该方法所计算的多维返贫指数具有一系列优良的属性, 符合多维贫困指数的公理性要求。本文将多维返贫的识别方法和多维返贫指数应用于 2010~2014 年中三个年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农民工面板数据, 从而获得对农民工贫困状况变动的认识: 第一, 返贫是中国现有农民工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 有超过 50% 的贫困农民工来自于返贫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处于较大的波动之中。这对中国现有的减贫和防贫政策有较强的参考性和指向性。第二,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返贫状况差异较大。其中, 新一代农民工的多维返贫指数总体低于老一代农民工, 但是, 二者差距在减小。这可能会对今后农民工迁移至城市产生影响。第三, 各个维度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返贫的贡献率不同。融入城市维度对新一代农民工返贫的贡献率较大, 健康维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返贫的贡献率较大。

为了更好得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 政府不仅需要关注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还应改善农民工多个维度的福利状况。现阶段中国农民工收入维度的返贫贡献率较低, 为了促使农民工市民化, 帮助其融入城市生活, 减小户籍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 对于新老两代农民工, 政策引导的着重点应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 1.阿玛蒂亚·森, 2002: 《以自由看待发展》, 任曠、于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郭熙保、周强, 2016: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经济研究》第 6 期。

- 3.王朝明、马文武, 2014: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按要素分解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10 期。
- 4.王朝明、姚毅, 2010: 《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 1990~2005 年》,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3 期。
- 5.王春超、叶琴, 2014: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经济研究》第 12 期。
- 6.夏庆杰、宋丽娜、S. Appleton, 2007: 《中国城镇变化的趋势和模式》, 《经济研究》第 9 期。
- 7.章元、万广华、史清华, 2012: 《中国农村的暂时性贫困是否真的更严重》, 《世界经济》第 2 期。
- 8.张志国、聂荣, 2014: 《贫困测度动态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第 22 期。
9. Alkire, S., and J. Foster, 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8): 476-487.
10. Gustafsson, B., and S. Ding, 2009, "Temporary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in Rural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1): 1475-4779.
11. Satya, C., and M. Amita, 2005, "Measuring Human Poverty: A Generalized Index and an Application Using Basic Dimensions of Life and Some Anthropometric Indicator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6(3): 275-299.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午言)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for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at Return to Poverty

Jiang Nanping Zheng Wanj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for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return to poverty, based on the improved A-F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s. It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fact that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poverty i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poverty. Second, the indices that measure 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than those for the elder generation, but the gap is shrinking. Third, indices such as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 have a different degree of influence on returning to poverty for the younger and elde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Index of Returning to Poverty